



客籍文
人与贵
州文化

黄万机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山竹班班漢已枯
龍馬歸來風滿湖
東湖山皆似君山
鳥呼一碧欲松間
聽唱惟歌入林去
日送南船去舍後
范湖山酒深客歲
月主人能送別何
事亦悲涼
宋劉同年蕭曼家
三子開

臣奉苦風熱不列不能微山過蘇州惟恨飲覺何人
離別須知對面灘渺渺漁舟仍獨去蕭蕭欲盡故園
來年待我春冰泮共爾清溪買釣竿
同第小谷家
舟山東南來晚晚欲度水清餘不相遠針方道之止想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客籍文人与 贵州文化

黄万机 著

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

黄万机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96千字

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南昌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100

ISBN7-221-02520-7/K·106 定价:6.80元

绪 论

毛泽东说过：“一定的文化（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）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，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；而经济是基础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。”（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）文化的发展与变化跟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很大关系，也受政治、历史传统诸因素的影响。由于各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、各民族生活习尚诸方面的差异，文化带有地域性的特点，也有民族的特色。

文化发展的过程，是不同地域的文化、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，同时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。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融合与分化，文化才葆有蓬勃的生机，才能由低级向高级逐渐进化。我国历史上就发生过几次影响深远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。最早的一次是殷周之际，武王率盟军“八百诸侯”伐纣，以后各族人民生活、交往，逐渐融合。秦汉之际的民族文化在更广阔的领域内融合起来，形成“汉族”这一民族共同体，也形成了汉文化。南北朝时期，汉族分别与南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相融合，直到隋唐时代，终于形成当时世界上的文化中心，科学、艺术、文学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。元、明、清的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，范围更大，内容也更广泛而深入。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更加丰富，也更富有凝聚力。

在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，除汉族之外，还有许多少数民族，它们各自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，但又在相互交流中取

长补短，在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时，又为民族大家庭的整体文化作出贡献。

从地域文化方面考察，中原文化历史悠久，与南方的荆楚文化在相互交流、撞击中互竞雄长；其他如吴越文化、巴蜀文化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它们对周围地区的文化发展有较大影响。贵州这片地域，北接巴蜀，东邻荆湘，历史上长期与巴蜀、荆湘等地进行文化交流，受其影响颇深。

据近三十年来的考古发掘，在贵州西南、西北和北部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，表明在五六十万年前，这里就有人类活动。他们是各民族的祖先，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劳动、生息、繁衍，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创造了贵州远古文化。

大约春秋时期，今黔北一带出现小邦国黔（一作鳖）国、缙国，在黔西、黔西南及云南、广西一大片地域上，出现了牂柯国。齐桓公“九合诸侯、一匡天下”时，牂柯国曾前去贡献方物。大约战国时期，夜郎国势力强大，取代牂柯而称雄南夷，控制着周围一些小邦国。正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所说：“西南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。”牂柯、夜郎的统治者都是奴隶主，进入奴隶制社会。黔东一带地域，则属楚国，建武陵郡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一度在夜郎等地设郡县，不久秦灭而废，直至汉武帝时派人通夜郎，终于在这里设牂柯、犍为、武陵等郡，下设若干县。随着郡县制的确立，这一带进入封建制社会。牂柯与巴蜀等地的文化交流逐渐频繁，促进了牂柯等地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

晋和南北朝时期，南中地区各大豪族割地称雄，相互混战。中央王朝派遣的郡、县官吏大都“遥领”而已，仅有谢氏大姓为其守境。隋唐时期，南中地区行政区划变动较大，州县名

称时有更改。州分两种：一为吏部正式委派官员统治的“经制州”，一为都督府指派当地土著豪族为官员的“羁縻州”。“羁縻州”官员为世袭制，对朝廷只有朝贡、出兵助战的义务，其他权力自专。此外，还有化外的部落，被叫作某某夷、某某蛮。这种羁縻关系，一直延续到宋朝末年。元朝统一全国，建行省制，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设“蛮夷官”，实行土司制，以民族头人为各级土司官。明代依然实行土司制，土官世袭。又于永乐年间建省，设布政使司。除黔北一带的播州隶属四川省（清雍正五年划归贵州）外，贵州行省设八府及若干州县。在府、州、县设流官。同时“参用土官”。土流并举，土司制仍在许多地区存在。

土司是一种极为落后的制度，不仅有世袭特权，还有独立的司法权，自设公堂、监狱，拥有自己的军队。辖境居民都被视为奴仆，他们没有人身自由，更无政治权利。这一制度严重影响社会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除少数开明的领主、土司官（如播州杨氏等）乐于招请客籍文士、重视文教外，大部分领主、土司官都封疆自固，妨碍了与外地的文化联系与交流，因而阻滞了本地区、本民族的文化发展，以致出现了“千年文化断层”的奇特现象。直到清朝雍、乾之际实行“改土归流”，贵州境内的土司制度才最后消灭，封建的生产关系得以确立。这对贵州的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。

从西汉到清末二千余年间，贵州文化的发展走着一条艰辛而曲折的道路，恰如在险峻的山道上跋涉，时而履步高山，时而涉足深谷，荆棘丛生，举步维艰。回忆这段曲折起伏的历程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：凡是黔中文化发展较好、较快的时期，也正是本地文化与外地文化（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的

汉文化)交流频繁、各民族间和睦相处的时期。黔中文化的发展,与历史上几次大的汉族移民及外籍文人入黔游官、游历和定居有很大关系。

两汉期间,一批较为“贤能”的官吏来牂柯任职,他们善于处理豪族之间的纠纷,有较高威望,对稳定南中社会秩序有重要作用,从而促进这一地区经济、文化的发展,出现了舍人这样的学者和尹珍这样的教育家、书法家。

从南北朝至宋代,各豪族、领主间常有争战,社会局势混乱时期多于稳定时期,文化的交流受到阻碍,各民族虽然也在尽力发展本民族文化,也出现了不少文化成果和文化人才,但发展是艰难而缓慢的。比如彝族很早就创造了本族文字,大约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际出现了一批文人和作品,其著名者有举奢哲,阿买妮(女),写有诗歌及诗文论多篇;唐宋之际的布独布举、布塔厄筹、举娄布佗等,也有作品传世。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,他们的作品只在本民族部分有文化的人中流传,后来几乎湮没,直至近年才发掘和译成汉文。以前无法与汉文化进行交流,极大影响了这些文化成果的传播和应发挥的作用。

南宋时期,播州杨氏对本地区控制力量加强,社会相对安定。从杨选起,几代领主重视文教,大量招请蜀中文士入播,设立学舍,建孔庙,后来又请贡士入朝。黔北一带文化有了较大发展,居然有冉从周等八人考取进士,出现了冉璉、冉璞这样的文武兼备的人才。南宋末年,蒙古大军多次蹂躏四川,蜀中民众纷纷迁往播州避难。对其中的文人,播州土司官优先安置,割田置产,使其安居。元初杨汉英更能礼贤下士,投奔他的文士更多,从而出现播州文化繁荣的局面。

明代洪武年间,朱元璋派大军征滇黔。后来,兵丁留下屯

垦，称为军屯；又从江西、湖广迁移数十万汉民入黔屯垦，称作民屯。他们带来了汉族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和文学艺术，与土著民族长期杂居共处之际，在生活习俗及科学文化方面互相影响、融合。这是贵州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，影响极为深远。此后，弘治间明兵征伐苗民，明末平定杨应龙叛乱，都有大批兵卒留戍和汉民迁入。他们的后裔，有的成了黔中杰出的文人学者。如明代著名戏剧家、画家徐渭（文长），其祖先就隶属贵州龙里卫军籍，他父亲徐鏊就利用贵州军籍的资格，去云南考取举人，以后做过知县、同知等官。其老家在浙江山阴（绍兴），长期以来，人们都把徐渭视为贵州人。又如莫友芝的祖先是江宁上元县随军征讨都匀苗民，后落籍于独山。郑珍的入黔始祖郑益显，原是平播大将刘綎部下的游击将军。沙滩黎氏家族在平播后由四川广安迁来遵义，十几代人坚持办学，终于在清代嘉道至同光之际，涌现几十位学者与诗文家，形成了名闻遐迩的“沙滩文化”；其代表人物郑珍、莫友芝、黎庶昌，成了驰誉海内外的学者与作家。

贵州文化的发展，一批出色文人学者的产生，又与客籍文人的教示、奖掖有密切关系。他们游宦或游历入黔，还留下了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和学术著作，直接间接地陶染了黔中文艺家和学者。有的虽未涉足黔境，但黔人出外游学、游幕，与外籍文人交友，得其指款或推许，使黔人扬名于中州或江淮，或学成归教南域，对黔中文化的发展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。总之，黔中文化的成就，是客籍文人与黔中人民共同努力所取得的。本书从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的关系这一角度切入，采用由外入内、因客及主、师友联叙的写作方式，既写客籍文人在黔的文化活动及成果，也写受其沾溉、启导、奖掖的黔中文人的成

就，从而展示贵州文化的发展概貌及辉煌成果，探索某些规律性的东西，并从前人成败得失中寻觅某些经验教训，以便为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有益的借鉴。

本书分成六篇，每篇又分为若干则。六篇标题为：“教育篇”、“文学篇”、“学术篇”、“艺术篇”、“史志篇”、“风物篇”。现分篇略述于后。

“教育篇”，起自东汉尹珍，终于清末李端棻。尹珍从毋歆县（在今贵州独山县一带）跋涉数千里去京师洛阳，拜经学大师许慎为师，学成回归南域，设学授徒，传播中原文化。他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，后世人民敬重他热爱桑梓、献身教育的精神，从唐代以来，为他修建“讲堂”、祠庙，至今贵阳仍有“尹公祠”。南宋后期，播州领主杨粲开始建官学，聘请蜀中文士任教，培育本地子弟。其子杨价向朝廷呈请，得“岁贡士三人”的权利，直接送贡士入京会试。文化教育的发展，也推动了播州经济的繁荣和武力的强盛。明代中叶，王阳明被贬谪为龙场驿在今修文县丞，他创建龙冈书院，教授子弟，又受聘去省城文明书院讲学。在黔三年，直接培育了陈文学、汤昇等人才。他离黔后，人们修建阳明书院、阳明祠，作为永久纪念。在贵州教育史上，王阳明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。

明代对教育有贡献的，还有王阳明的友人毛科、席书。席书礼请王阳明来文明书院讲学，以师礼敬侍王先生。王杏创修阳明书院，又请准在贵阳设乡试考棚，免除贵州秀才去云南应试之苦，对激励士气很有作用。万士和捐资办学，开办学新风；邹元标讲学都匀，后人办南皋书院纪念他。

有清一代，一批有远见的官员重视文化教育，其中贡献

大的有康熙年间的田雯（巡抚）、乾隆年间的洪亮吉（提学使）、道光年间的程恩泽（提学使）、贺长龄（巡抚）、光绪年间的严修（提学使）。福州人张甄陶于乾隆年间来黔任贵山书院山长，十一年间，培养了大批人才。贺长龄创办孤儿“义塾”，教文化又教技艺，使之长大后能独立谋生，可算是黔中职业教育的先声。严修以贵阳学古书院为改革试点，在全省范围内招收学业优异的子弟入学，除经史外，还开设外语、数学、格致（化学、物理）、地理、外国历史等课程。使学生学习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，为黔中开一代新学风。李端棻受梁启超、康有为影响，积极宣传维新思想，向皇帝上《请推广学校折》，提出一整套教育体制改革方案，要求在京师、各省、各府县设立各级学堂，开设西方自然科学课程，并在各地建藏书馆、仪器馆、报馆、译书局，以利于广开民智。晚年返贵阳任教，仍坚持宣扬西方学者的科学、民主思想。

“文学篇”中有被贬为“龙标尉”的王昌龄。龙标地域大约在今湘黔接壤的黔阳、黎平、锦屏一带，至今留有昌龄祠、昌龄墓等遗迹。他在这里写的一些诗歌，表现了诗人悲欢情绪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据史载，宋代就有诗人赵高峰所写《青莲院诗集》。元代杨汉英有《桃溪内外集》，但都失传，不存一首一篇。黔中诗人有作品留传至今的，最早当推明代王训等人。其中宋昂、宋昱的作品被辑入《明诗综》。他兄弟俩是仡佬族，贵州宣慰同知宋斌之子，受教于福建诗人廖驹，著有《联芳类稿》。后由南京吏部侍郎罗圭峰作序刊行，推许边荒之地的两位出色诗人。

明末黔中诗人谢三秀，早年得著名诗人吴国伦奖拔、指教，又受知于贵州巡抚郭子章，晚年游历江淮，与汤显祖、李

维桢等交游，相互唱和，得他们的称许，诗名陡起，是明代黔中诗人成就最高者。明末另一位诗人杨文骢，与江南众多名士交游，如与陈子龙、吴伟业等一代诗家相互唱和，友谊深笃。他后来起兵抗清，全家殉难，成了受人尊崇的民族英雄。

清初贵州诗人周起渭（号渔璜），早年受知于贵州巡抚、诗人田雯。入京师任职翰林院多年，得前辈诗人王士禛、朱彝尊、宋荦等的推许，与同辈诗人查慎行、姜宸英、史申义等交游，并与查慎行同执京师诗坛牛耳。渔璜“异军特起，乃拔帜自成一队”。史申义赠诗中有“孰与夜郎争汉大，手携玉尺上金台”之句，推尊为文坛魁首。毛奇龄为渔璜诗集作序，称他“以谗天之才，力持大雅。”

乾隆年间，李绿园出任印江知县，并漫游黔中各地，写了几十首诗，题名《黔说》。他创作的长篇小说《歧路灯》近年才得出版，引起全国轰动，郭绍虞、朱自清等名家极力推许，认为可以与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媲美。他写的《游仙人洞》诗，是黔中纪游诗中的佳篇。

贵州的两位戏剧“传奇”作家傅玉书写有《鸳鸯镜》，任璇写有《梅花缘》。傅氏受知于乾隆年间著名诗人钱载，钱为傅氏《竹庄诗文集》作序。任氏剧作得其好友张岱庵批语，把它与汤显祖《牡丹亭》并提，褒奖稍高，而任剧确也颇有才情。

道光年间名闻高丽诸国的诗人吴嵩梁入黔任黔西知州，并充乡试同考官。黔中青年诗人张琚、陈钟祥、莫友芝、戴禾庄、史胜书等拜他为师，得其指教，诸人诗艺大进。道咸之际的满人裕瑚鲁承龄，是位著名词人，又能写诗。他先后任贵西兵备道道员、贵州布政使。他礼聘莫庭芝为家庭塾师，与黎兆勋等交游唱和。他对年轻的黎庶昌十分赏识，视之为“国士”，

出盘缠资助他赴京应乡试。后庶昌为他的《大小雅堂诗集》作序。

郑子尹青年时代游幕长沙，拜程恩泽为师，借游幕以游学。程恩泽和湖南欧阳绍格、邓显鹤都是宋诗运动的倡导者。郑子尹与湖湘诗人交游唱和，受其濡染，终于走上宋诗派的道路。莫友芝得郑子尹介绍，也与湖湘文士结下深厚情谊，交流学问，切磋诗艺，为黔湘文化交流史谱写出璀璨的篇章。后来，郑、莫一跃而为宋诗派代表作家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莫友芝晚年流寓江表，与江淮文人学者广泛交游。在曾国藩幕府中，被待以宾师之礼，与同幕僚友汪士铎、方宗诚、刘毓崧、张裕钊、李宗羲等情谊深厚，又与藏书家郁泰峰、丁日昌，学者王柏心、翁同书、翁同龢、张之洞等过从甚密。莫友芝在治学、校勘等方面，都得他们的帮助。当时江苏有位青年诗人杨葆光，给《邵亭诗钞》作了评点。他们推奖黔中诗人学者，功不可没。

黎庶昌在江南，与当时海内散文名家交游。拜曾国藩为师，与张裕钊、吴汝纶、薛福成同为曾门四大弟子。后出使西洋、出任驻日本国钦差大臣，深入体察东西洋国政民风，文思泉涌，写了《西洋杂志》一书及多篇散文，文笔笃雅可诵，能独树一帜。他同其随员陈矩、孙点、杨守敬等常与日本文人游宴唱和，促进了中日文化的广泛交流。在他影响下，贵州先后有多批学子赴日游学，使黔日文化交流更加深入。

“学术篇”内容比较丰富。远在西汉武帝时代，就出现了“犍为文卒史”舍人，生长在犍县（今遵义、桐梓一带），去成都等地求学，终于通贯百家，学究天人，与司马相如、张宽等上下驰骋，为词书《尔雅》作注，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个训诂

家。可惜传薪乏人，此后一千余年，贵州这片地域上绝少研究学术的学者。元初播州土司杨汉英精研洛闽之学，写出理学专著《明哲要览》90卷。但此书已佚，只知他与当时诗人兼理学家姚燧交谊深厚。杨汉英八次赴京，姚氏写有《播杨侯朝觐本末》，又有唱和诗。可见汉英研治理学受姚燧影响较深。

贵州学术史上影响最大的是明中叶的王守仁（世称阳明先生），他在龙场驿受过艰苦生活的磨炼，悟出“格物致知”的大旨，为形成“心学”的哲学体系奠下基础，并在贵州首先讲学，传播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。这一哲学体系要求以“吾心”去体认“良知”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。这就冲破了程朱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，破除“圣贤”绝对权威的观念，从而掀起一场思想解放运动。阳明学说对中国思想界有巨大影响，对日本思想界的影响尤为深远。王阳明在贵州的再传弟子孙应鳌、李渭，有多种著作刊行，不仅是贵州杰出的思想家，而且在全国学术界也有相当的影响。

有清一代，以文字训诂辨伪、名物制度考证为中心的汉学勃然兴起，乾嘉之际达到鼎盛阶段。地处边隅的贵州，直到道光年间才有人研治汉学。而引渡津梁的人物有两位：一是歙县程恩泽，一是独山莫与俦。他们的门生郑珍、莫友芝后来跻身于汉学大师之林，有“西南巨儒”的称誉。其学术成就和影响，远远超出其师长。清末民初的姚华，得贵阳学古书院山长雷廷珍的指教，精研文字学，有著作多种，并有戏曲理论方面的著作，在学术界很有影响，堪称黔中学术界的殿军。

贺长龄治宋学，曾纳郑珍为门生。郑氏坚持“治经宗汉，析理尊宋”的治学宗旨，拟汇汉宋为一藪。郑珍的再传弟子宦懋庸著成《论语稽》20卷、《两论蠡测》2卷，有新颖独到见解。

“艺术篇”勾勒黔中艺术发展的轮廓。早在东汉晚叶，尹珍就成了当时有名的书法家。南朝王僧虔的《文字志》分题论述秦到晋代120位书法家，尹珍与李斯、王羲之等收选入内。北南宋之交的镇远女道士宫素然学习龙眠居士李公麟的白描手法，并受其审美观念启导，创作了《明妃出塞图》。此图真迹藏于日本，有印制图册传世。

南宋晚叶的杨粲墓石刻，造型精巧，刻工娴熟，出自蜀中无名艺匠之手。本世纪50年代发掘，现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明嘉靖年间，画家龚辉被任命为采木官员，来川南黔北一带山区督采巨木运往京师。目睹运木工程的艰巨，工匠们的危险处境，特画了《采木图》十五幅，每幅题写说明文字，以此上呈皇帝，以画为谏。皇帝见图后，得知民情汹汹，才一度停止采木。

明代成就最高的黔中画家是杨文骢（字龙友）。他在浙江天台、雁荡山中写生，画成图册《山水移》，颇得江南名流推许。他曾拜画坛泰斗董其昌为师，受其教益良多。另一老画家陈继儒把龙友与董其昌并提，董氏也心服此论。

清初，常熟人黄向坚去云南寻父，为黔中瑰奇山水所吸引，绘成册页《寻亲图》（现有八幅藏于贵州省博物馆）和《盘江图》轴等，表现了壮丽雄奇的黔中山水特色。乾隆初年，无锡人邹一桂出任贵州学政，先后六年，踏遍黔中山山水水，写有画稿若干幅，后来画成《山水观我》图册，得多家题跋，极为珍贵（现有24幅图册藏贵州省博物馆）。他有《小山画谱》一书，对我省艺术家有很大的启导意义。道光之际，何绍基一度任贵州乡试副主考，与黔中书法家交游，切磋书艺，并留有多幅墨宝，对黔中书法界有较大影响。

光绪中晚期，贵州有两位书画家；何威凤和严寅亮。何得著名书家翁同龢激赏，并向达官推荐，由于何威凤秉性刚正，未得重用。严寅亮得曾纪泽赏识，向庆亲王奕劻推荐，再由奕劻引荐，被慈禧太后召入颐和园，为园门题榜，并书写园内楼亭对联十几副。严氏成了名噪一时的书法家，对黔中艺术界影响很大。

清末民初的书画大师姚华，与京师名流陈师曾、王梦白、陈半丁、陈叔通、齐白石等交游，梅兰芳、王瑶卿、程砚秋等均拜他为师。又创办京华美术学院，广育人才，又自创“颖拓”艺术，影响颇大。当代书法大师萧娴，少年时代拜康有为为师，书艺大进，有“当代卫夫人”的美誉。

“史志篇”重点评介十几部有影响的史志著作。其中有的由客籍文人主修、本地文士编纂，有的修纂均是客籍文士。最早记载“南中”（包括今贵州疆域）史迹与地舆情况的，是晋代常璩的《华阳国志》。见于书目者有宋代《思州图经》、《珍州图经》，元代有《顺元路安抚司志》、《播州宣慰志》等多部，均已亡佚。现存较早的方志是明弘治《贵州图经新志》。本书重点评介谢东山主修、张道编纂的嘉靖《贵州通志》和沈思充修、陈尚象等纂的万历《贵州通志》。郭子章个人编撰《黔记》60卷，内容浩博，资料详实。王士性《黔志》一卷，有一些可贵资料。宋濂《杨氏家传》，介绍播州杨氏十几世的事迹，很有史料价值。

清代修志特多，康熙年间由吴中蕃等纂写的两部《贵州通志》较有价值。鄂尔泰所修省志质量略逊一筹。私家撰述的史志类型的著作不少，较出色者有田雯《黔书》、张澎《续黔书》、李宗昉《黔记》、吴振棫《黔语》。其他如严煜如《苗疆风俗考》、贝青乔《苗俗记》、徐家干《苗疆闻见录》、爱必达《黔南识略》等，

都有文献价值。

清代修纂的各府、州、县志，多达 200 余种，质量参差不齐。除郑珍、莫友芝的《遵义府志》被誉为“天下府志第一”之外，被列为全国名志的有《贵阳府志》、《兴义府志》、《安顺府志》和《大定府志》。而这四部志书，都是经邹汉勋参与主纂或独力主纂的。邹汉勋是湖南著名学者，早年因纂辑《宝庆府志》而闻名，后经贺长龄推荐，受聘入黔修志，完成几部高质量的志书，备受林则徐等前辈赞誉。

“风物篇”论述客籍文人游黔题咏山川风物的作品，大量的诗歌，少数词作及古典散文纪游作品。宋、元诗人题咏者无存。明代以后，题咏之作数以千计。

明人王守仁、杨慎、吴国伦，是颇有名气的诗文家，他们的题咏，为黔中山川增色不少。江东之建甲秀楼，又写散文和诗歌题咏这一黔中名胜；后来题咏者、题联者相继不绝。徐霞客《黔游日记》2 卷，对贵州山水地貌、名刹胜迹有生动而详细的描绘。游白云山、碧云洞和白水河瀑布（今黄果树瀑布）等篇章尤为精彩。为纪念这位伟大旅行家，黄果树瀑布侧塑有他的大理石雕像。明末学者曹学佺撰有《贵州名胜志》，录写了不少文士纪游之作。

黔中几处著名胜迹，为历代诗文家和学者所注目。如关岭的“红岩碑”吸引了中外无数学者与旅游者；探索其神秘碑文（或叫花纹）的文章连篇累牍，至今仍未全揭其谜。黄平飞云崖、镇宁黄果树瀑布、侗家的鼓楼与风雨桥，历代名家名作不少。

清代游黔的诗文名家较多，如查慎行、赵翼、洪亮吉、舒位，何绍基、林则徐等，都是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诗家，李良

年、董儒龙、承龄是名气很高的词人，汪炳璈的楹联独具特色。查、赵、洪、舒、何等人的黔中纪游作品，各自多达一百或三四百首。游黔诗文家们以个人独特的眼光、独具的心绪与审美情趣，来观察、品赏黔中奇瑰幽丽的山水风物，并以不同的表现手法形诸吟咏、文章或楹联，写出了风格多采、韵味各别的文学作品，为山川添彩，更为黔中文化增辉。

透过上述文化现象，我们不难从中发现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。

首先，从土著豪族与中央王朝之间的关系方面来考察，每当土著豪族臣服中央王朝，社会较为安定的时期，各地的经济、文化都有较大发展；如果各豪族据地自雄，或相互争战，则必然阻滞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

其次，从文化交流方面考察，每当汉民移入与贵州境内各少数民族杂居共处，相互广泛交流文化的情况下，互相取长补短，各民族的文化均得到较为迅速的发展。如固步自封，排拒外地和别族文化，本族文化也难以提高。

第三，客籍文人游宦或游历黔中，从事各种文化活动，或著书立说，或授徒讲学，或题咏山川，或开办文化事业，或奖励推荐黔中人才，从而传播汉文化，提高贵州人民文化素质，促进民族和睦共处，发展黔中文化。他们的文化活动，特别是明、清之际一些著名文人在黔中的活动，是贵州文化繁荣、发展的根本条件。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地域之间、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，已成了不可阻遏的趋势。不仅如此，对世界文化的冶炼、吸收，也成了发展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因素。

从贵州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，虽早在汉代就有舍人、尹